

近四十年南宋末政治史中文論著研究

方震華

一、前言

民國以來對宋史的研究，北宋史的部分一直比南宋史發達，而南宋從理宗到亡國的一段歷史，又是南宋史研究中最弱的一環。其原因大致有二：一是史料的缺乏。宋代本有良好的官修史書制度，但理宗以下因已瀕臨亡國，官吏多未修成（註一），以致現存的資料不僅少而且零散，處理不易。研究者又需對金史、元史有所了解，參考金、元方面的記載，所花的工夫相對的增加。二是學者對此時期心存輕視。南宋一向被視為積弱，使人覺得不值得研究（註二），理宗以後，南宋的外患不斷，欲振乏力，是整個南宋史中最不光采的一段，更使學者提不起研究的興趣。

最近幾年在學者的提倡下（註三），宋末歷史逐漸受到重視，尤其大陸學者在這方面論著增多。不過，研究的課題多集中在少數幾個領域，尚有不少問題有待研究。本文將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八九年間以中文撰述的研究，概略分為四個領域：宋蒙關係史研究、政治人物傳記、宋末朝政和變亂研究。希望能藉此看出目前研究的趨勢，作為繼續開展南宋末年歷史研究的參考。唯本文對大陸地區的研究，雖已盡力搜集，但遺漏在所難免，以此推論恐有偏頗之嫌，尚祈方家不吝指正。

二、宋蒙關係史研究

宋蒙關係史的研究在宋史和元史學者的努力下，對宋蒙間交戰、議和的情形已有不少成果，是南宋末年歷史研究中最有成績的部分。其中，宋蒙戰史研究是由姚從吾首開其端，姚氏治元史，發現余玠在四川建築山城，使蒙古大汗蒙哥死

於釣魚城下，對元史，甚至世界史都有重大的影響。於是作了一系列的有關宋蒙在四川交戰情況的研究，如：「元憲宗（蒙哥汗）的大舉征蜀與他在合州釣魚城的戰死」、「宋余玠設防山城對蒙古入侵的打擊」等，以闡明這一段歷史。宋蒙雙方長期交戰的歷史乃逐漸受到重視。至一九八八年李天鳴著《宋元戰史》和陳世松等著《宋元戰爭史》的出版，代表這方面的研究已有相當的成績。

李天鳴的《宋元戰史》共四冊，有二千二百頁，一百八十五張地圖，內容相當豐富。作者寫本書的目的，是想以戰史作為培養兵略家的教材，故特重戰略的分析。在內容上試圖將宋元戰爭中，有史料可考的戰役都記載入書中，使後人得以憑藉效法。所應用的史料包括文集、筆記小說、方志和大陸近年考古成果，幾乎所有現存的史料皆加以蒐集、應用。全書詳盡敘述戰爭的經過，對雙方使用的武器，亦有詳細的研究，並略述宋蒙雙方政治、軍事制度。全書考證精詳，內容巨細靡遺，也因此使得篇幅太大，繁而不要。而且全書是從戰略、戰術眼光出發，平面的敘述戰爭經過，缺乏對史實的分析、解釋，如對最後檢討元勝宋敗的原因，指出元軍戰力比宋強，元在後期所用的戰略正確等，只能算是陳述事實，而非作解釋。反而以大量的篇幅來討論雙方戰法，不僅瑣碎，又有不少重複之處。

陳世松等四人合寫的《宋元戰爭史》亦以敘述宋蒙戰爭的經過為主要目的，在內容上以元的南侵為主，宋的防禦為輔。全書只有四百頁，與李書相比，敘事較粗略，卻也因此較李書簡明扼要，便於閱讀。但缺點是不夠嚴謹，在註釋方面有不少誤註、漏註，使讀者無法知悉所引用的資料。敘事上亦有部分值得商榷，如說趙范未參與「端平入洛」之役（頁四三）；襄樊之役時宋廷未籌畫解圍（頁三七九）等。另外，本書對史實分析、解釋的部分篇幅很少，故所論不夠深入，如作者將南宋在戰場上的失敗，全歸咎於政治腐敗，太過簡化。

由以上的分析可知，李、陳兩書在篇幅上雖然相差很大，但在寫作取徑上都是以敘述戰爭經過，分析戰略為主要的方向。不只這兩本專書如此，其他研究宋蒙戰爭史的論文，也多半是朝這種方向來寫作，如：黃寬重的「宋元襄樊之戰」，鄒重華的「略論蒙哥、忽必烈的攻宋戰略」，盧渝寧的「宋蒙（元）兩淮戰場析論」等，敘事雖詳略有異，觀點或有不同，但所論述的不出這個範圍。將戰爭經過整理清楚，是研究戰爭史最先要做的基本工作。目前的研究在這方面已有相當不錯的成績，李天鳴的書雖然瑣碎，畢竟對整個宋蒙戰爭經過做了全面而詳實的整理。要進一步研究宋蒙戰爭的學者，似應改

變過去平面的研究方式，對史實做深入的分析和解釋。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對雙方採用的戰略作分析，以史學的觀點而言，這是不夠的，應解釋造成這種戰略的因素。如：蒙古的戰略由窩闊台時「不利其土地」的掠奪式戰略，變成蒙哥時代在邊境築堡、屯田，有計劃的進攻，是什麼因素造成的？又如：宋在端平元年以後採取被動守勢，但亦有幾次北上攻擊行動，是什麼因素使其反守為攻？像這樣的問題應加以研究後提出解釋。而且軍隊在戰場上的表現，往往受到內部政治、社會、經濟等因素變化的影響，一本好的戰爭史，應從當時經濟、政治的背景來分析戰場上勝敗的原因。這是目前研究的不足之處，應是未來努力的目標。

在宋蒙外交活動的研究上，陳高華的「早期宋蒙關係和端平入洛之役」是談南宋和蒙古從宋寧宗時開始接觸，至理宗端平元年關係決裂的經過，和端平北伐失敗的原因。認為雙方關係破裂，是由於宋乘中原空虛，發動北伐，與傳言蒙古不遵守盟約無關。其對端平北伐的起因看法與黃寬重在「辨端平入洛敗盟」一文中的意見相同。

孫克寬的「元王檄使宋事補」是討論雙方關係破裂後，蒙古派王檄到宋議和的經過。作者認為王檄和當時北方一批儒者希望兩國和平相處，故幾次南北往返以促成和議。但宋蒙雙方條件差距太大，宋認為是講和，蒙古則要宋降附；加上宋廷黨派對立，多數朝臣反對和議，使謀和的努力終歸失敗。

段玉明「宋理宗時期的宋蒙關係剖析」全面探討理宗時期宋蒙和戰關係。作者認為初期是蒙古急於與宋和好，以連兵滅金。至宋北伐失敗後，則是宋想求和，但雙方和談並無結果。至忽必烈即位，因內部不安，為了防止宋乘機襲擊，派郝經使宋議和。但主持南宋政局的賈似道，為避免洩漏他曾在鄂州乞和之事，竟將之扣留。使得宋蒙之間最後一次緩和雙方關係的機會喪失，雙方的交鋒變得不可避免。

屈超立「簡析宋蒙鄂州之戰與『鄂州和議』」是一篇翻案文章。作者認為（宋史）和（元史）中記載賈似道曾在鄂州之役時向蒙古乞和，蒙軍因此才北撤的說法是不正確的。因為鄂州之戰，宋實居上風，元軍被迫北撤。而忽必烈在第一次宋詔書中並未提及鄂州議和之事，卻在十三年後的第二次伐宋詔中指責南宋違背和議，作為伐宋的理由，顯然是捏造的藉口。作者所論雖有根據，但證據仍嫌不足，其說尚未為學界所接受，如前引段玉明之文就認為鄂州之役時雙方雖無正式的和議，但賈似道曾提出對蒙古有利的條件，來請求蒙古撤軍則是事實。

目前學界對宋蒙在各階段的外交活動都有研究成果，已能大致瞭解整個情況的發展。但對一些較細的問題，如鄂州議和的眞偽，宋爲何屢次拘留蒙使等問題，尙有待更深入研究。

三、政治人物傳記

針對一位歷史人物作專題研究，在資料的搜集、處理上比較單純，容易入手。所以，研究重要政治人物的生平，往往是政治史研究的基礎工作。目前宋末衆多的政治人物中，成爲研究對象的，主要是幾位「民族英雄」，如：文天祥、余玠、王堅、孟珙等都有不少研究。至於其他政治人物，研究成果很少。

文天祥是被研究最多的宋末人物，據大陸在一九八六年的收錄，自一九五〇年以來已有二十一本書和將近一百篇的論文談文天祥（註四），臺灣地區尙有許多論文並未包括進去。如此豐富的研究成果，應以專文來加以檢討，本文因篇幅所限，對這方面的討論只好從略了。

余玠的研究始於姚從吾，姚氏先後寫了「宋余玠設防城對蒙古入侵的打擊」和「余玠評傳」討論余玠的生平和抗蒙的功績。在姚氏研究的基礎上，陳世松的〈余玠傳〉對余玠和他所處的環境做了完整研究。作者認爲傳記要注意傳主與其他相關人物的關係，和對當時社會的影響。因此，本書不僅研究了余玠的生平，亦是一本研究宋末四川政治、經濟情勢的佳作。作者深入的分析余玠所建立的防禦體系，及治蜀的成績。並指出余玠治蜀能有良好的成績，除了其才能卓著外，亦是由於當時蒙古陷入政爭，減少對四川的入侵。由作者不過分強調傳主個人的功勞，可看出本書的嚴謹。不過，本書仍犯了傳記研究常見缺點：偏袒傳主，而貶抑傳主在政爭中的對手。作者認爲在朝廷中攻擊余玠的謝方叔、徐清叟等人是破壞抗戰派，以各種卑劣手段迫害抗戰將領。這樣便把當時政治黨派之爭，簡化爲「抗戰派」和「破壞抗戰派」的對立，是不合史實的。作者對於余玠生平的討論一直放在整個政治環境中檢討，唯獨對余玠遭猜忌而死的問題，作如此簡化的處理，成爲本書的一項缺憾。

孟珙與余玠並稱宋末名將，有關的研究有黃寬重的「孟珙年譜」和「孟珙與四川」兩篇論文。前者是蒐集關於孟珙的

原始資料加以編纂，後者是研究孟珙在救援四川上的貢獻。

固守釣魚城，使蒙哥死於城下的王堅在（宋史）中無傳。爲了彌補這個缺憾，學界一直努力的尋找關於王堅生平的任何資料，但所得似極有限，乃用推論的方法。如對王堅籍貫的討論，由於找不到確實的證據，只好從王堅的封爵和生平活動的範圍加以推敲，在這種情形下自然是言人言殊了。唐唯目「南宋名將王堅籍貫再考」總結了大陸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研究，指出學界目前有四種不同的說法，而除了一種已證明爲錯誤外，其他三種都是有可能，但缺乏有力的證據來證明。由大陸學者對王堅籍貫的討論，可以看出他們對王堅研究的熱忱，即使史料缺乏仍盡力想求得解答。但爲了這一問題，花這麼多的力氣是否值得？恐怕需要作一番省思。

經歷了寧、理、度三朝，在政壇上幾度起落的劉克莊，其政治生涯與宋末幾次重大政爭都有牽扯。孫克寬的「劉後村之家世與交遊」和「晚宋政爭中之劉後村」是兩篇相連貫的文章，前者敘述其家世、交遊和得罪權相史彌遠的經過。後者討論劉克莊與鄭清之、史嵩之、賈似道等當權宰相的關係。除了敘述劉克莊的生平外，並對當時朝中黨派相爭的情形有所討論。

汪立信在度宗朝曾任京湖制置使，元兵南下時在高郵殉國，王德毅的「宋季忠烈汪立信年譜」考訂其生平，以表彰其忠義之氣。

晚宋著名的理學家真德秀，也是寧宗、理宗兩朝清議派的領袖。朱鴻的「真德秀及其對時政的認識」討論真德秀的政治主張。作者認爲真氏的政治主張是與其學術內涵相符合的，由於理學主張反求諸己，故其主張整飭內政以應付外患，而不顧國際政治的情勢，對蒙古採取不和、不戰的策略，實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看法。

夏貴是宋末重要的將領，最後降元，在（宋史）和（元史）中具無傳。孫克寬「入元宋將夏貴事蹟輯」只是將現存有關於他的史料加以搜集、考訂，尙有待進一步的研究。夏貴是衆多降將中，唯一被專題研究的對象，除了因地位重要外，亦與他的墓誌銘傳世，資料較多有關。

由以上敘述可知，研究者對「民族英雄」的興趣極高，即使沒有太多史料亦盡全力來研究。相反的，被視爲奸臣的史彌遠、賈似道、史嵩之、丁大全等人，即使有不少資料也得不到學者的青睞。這種研究趨勢，使得許多在宋末政治上有重

大影響的人，卻沒有學者加以討論。

四、宋末朝政

關於宋末朝中人事的升降，政策的遞變等內政上重要問題，研究者卻很少，與宋史其他時期的研究相比是很特別的。

黃寬重的〈晚宋朝臣對國是的爭議——理宗時代的和戰、邊防與流民〉是從理宗朝最受爭議的三個問題入手，由當時朝臣的議論，探討當時的黨派之爭和施政的得失。作者指出當時對邊防、和戰和流民處理的討論，往往成為政爭的手段，而政爭也造成宋在處理這些問題上態度搖擺不定。由於對這些問題的爭議多半發生在寧宗末年、理宗初年，故本書所討論的亦是這個時期的朝政變化。理宗朝晚期對這三個問題的討論停止，本書便略而不談，因此並未完全涵蓋整個理宗朝政事的發展。

段玉明、胡昭曦「宋理宗『端平——淳祐更化』芻論」是討論理宗親政後，在端平至淳祐之間約二十年，進行內政改革的情形。作者指出當時的改革大致有：拔賢黜佞、整頓吏治、部署防蒙和整頓財政等幾項。這些問題都牽涉很廣，但本文的篇幅很少，故所作的討論並不深入。如：「拔賢黜佞」一項，只是列與幾十個人名，並未具體討論這些「賢者」在當政時有何具體建樹。且一些用語不明確，如說吏治在整飭後「略有起色」，此語使人弄不清整頓的效果究竟如何。所以，本文並未釐清此時期政治的發展，尚有待更多的研究來加以闡明。

研究南宋亡國經過的有王瑛「綜析伯顏攻宋戰爭中南宋滅亡的原因」。本文檢討度宗咸淳十年至祥興二年共五年的歷史。從南宋的政治、軍事情勢檢討南宋亡國的原因。作者認為賈似道的長期當權使南宋的朝政腐敗，重文輕武的風氣，造成將士離心，於是元軍南下各地守將紛紛投降。而繼賈似道的朝中主政者不思抗敵，一意求和，最後見求和不成竟紛紛逃走，使朝廷無人支持，迅速瓦解。文天祥、張世傑等人雖擁立二王繼續抵抗，但彼此不合，張世傑實操縱一切。而張世傑所採的戰略錯誤，只想遠遁，終遭致被消滅的命運。本文引證豐富，所論頗為深入，但仍存在一些問題。如：作者認為在宋代重文輕武的風氣下，產生了文臣殉國，武臣叛降的現象，不知何以得出這樣的結論。因為在元軍南下時，宋的文臣、

武將有投降的，也有殉國的，很難斷定文臣殉國的比武臣多。把武臣的投降歸咎於重文輕武也有問題，因為整個宋代重文輕武的風氣一直存在，宋蒙戰爭打了四十幾年，爲什麼到這時候才投降？所以，作者對南宋滅亡的看法，仍值得商榷。

宋末是一個長期戰亂的時代，武官的重要性自然增加，屈超立的「論呂文德及呂氏軍事集團」認爲在度宗時由於武人勢力高張，加上賈似道的扶持，出現了宋代歷史上勢力最大的呂氏集團。這個集團以大將呂文德爲首，他的親戚和部屬都分任邊防要職，控制了宋的邊境。呂氏集團在襄陽之役奮力抗元，但自襄陽失守，其成員便紛紛降元，造成南宋的土崩瓦解。本文由於篇幅過短，引證不夠豐富。雖然呂文德的親屬和舊部皆居高位，但是否能稱爲一個「集團」？恐怕還有待商榷。宋末武人勢力膨脹到何種程度，仍有待更多的研究。

總結目前對宋末朝政的研究，很明顯的不足。除了對宋亡國前夕的歷史，由於文天祥研究的發達而有較清楚的認識外，對其他時期的研究只能算是初步的探索而已，實有待更多學者的投入。

五、變亂研究

宋末的變亂中反覆於宋、蒙、金之間的山東忠義軍，對宋、金、蒙三方都有重大的影響。趙儷生「南宋金元之際山東淮海地區中的紅襖忠義軍」、李春圃、何林陶的「關於李全的評價問題」和孫克寬「南宋金元間的山東忠義軍與李全」主要都是討論在寧宗末、理宗初山東義軍中最重要領袖李全，研究他起事的經過和分析他最後叛宋降蒙的原因。趙氏強調李全是一直忠於宋的，但宋不斷對義軍猜忌、欺壓，使他不得不降元。李春圃則反對趙氏的看法，認爲李全早期的活動雖是忠義的，但自歸宋任官以後，立場改變，企圖建立自己的政權，故其反宋不應全歸咎於宋。孫氏認爲李全兼具民族意識和英雄主義，投宋後漸有自立的打算，結果捲入了宋廷的政爭中，終致叛宋降元。黃寬重「南宋時代抗金的義軍」中第四章「寧宗、理宗時期的義軍」則對此時期義軍的組織、活動、影響做全面的探討，對過去研究較強調民族意識和農民性格的解釋，有所修正。指出宋對義軍的處理涉及宋末朝中的政爭，因此宋對義軍政策一直搖擺不定，而義軍亦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，終於投效蒙古，轉而成爲蒙古滅宋的先鋒。

至於研究南宋內地發生的民變，則有華山的「南宋紹定、端平間的江、閩、廣農民大起義」。本文研究理宗紹定元年至端平元年，蔓延於福建、江西、湖南、和廣東各地的農民起事。作者認為起因除了災荒、貪官迫害外，主要是私鹽組織反抗政府查緝造成的。南宋最後靠地主、富農組成的民兵才平定亂事。而端平以後，蒙古積極南侵，民族衝突使階級問題變成次要，所以端平以後農民起事便減少了。朱瑞熙的「南宋晏夢彪起義」是研究這場變亂中以晏夢彪為首的一股勢力。作者考證晏夢彪起事始於紹定元年十二月以前，至紹定四年才被消滅，活動範圍曾包括福建大部分和江西部分地區。參與者奪取地主的土地為己有，使亂事平定後產生很多「賊絕田」，作者認為這代表農民對當時的土地剝削已有了認識，是農民戰爭史上的大事。溫嶺的「南宋末年江西建昌農民暴動」是討論發生在寶祐六年和咸淳四年江西建昌的農民暴動。作者認為這二次暴亂起因於受地主剝削的佃戶，在天災造成的饑荒打擊下，相聚為盜，曾攻陷縣城。作者根據王柏的《魯齋集》，指出當地每隔一、二十年就有動亂發生，並推論在南宋其他地區，動亂也一定如此頻繁，只是保存的資料不多，有待發掘。

目前對變亂的研究尚限於民變，對於山東忠義軍的探討已有很好的成績。但關於南宋內部的民變，因史料零散，研究成果比宋代其他時期少了很多。理宗端平以後民變是真的減少？或是如溫嶺所言是因史料零散缺乏，使這類事件隱沒不為後世所知？假若是真的減少，其原因是否如華山所言是因蒙古入侵？這些問題都是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才能有較清楚的答案。而民變以外軍隊的叛變很重要，宋末幾次大兵變如：端平三年的襄陽之變，景定二年的劉整降元等，對宋末軍事、政治都有重大的影響，都有待學者進行探究。

六、結 論

政治史研究中，一個朝代內部政局的變化應是主要的焦點，但目前南宋末年政治史研究正好相反，對外關係的研究成績，遠超過對內政的探討。結果，不只對宋末朝政發展沒有清楚了解，戰爭史的討論也同樣不能深入。如目前對為何宋軍在戰場上常處劣勢的解釋，都不夠具體、深入，即因學者對宋末政治、社會情形尚無清楚瞭解，無法由這兩方面做深入的

分析。因此，目前的當務之急似應朝宋末內政多加努力，才能對整個宋末歷史有更全面的了解。不過，主持宋末朝局者多半是所謂的「奸相」，對於這些負面人物的生平，研究者顯得興趣缺缺。但這些政壇上的關鍵人物不研究清楚，就對宋末政局中許多重要問題無法瞭解。所以，學者實應拋開既有的成見，站在學術的立場，加強對這方面的研究。唯有多朝新領域開拓，我們對宋末歷史的了解，才能有快速的進展。

引用書目：

一、宋蒙關係史研究

1. 專書：

李天鳴，〔宋元戰史〕（食貨出版社，台北，民國七十七年）。

陳世松等〔宋元戰爭史〕（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成都一九八八年）。

2. 論文：

姚從吾，「宋余玠設防山城對蒙古入侵的打擊」（大陸雜誌）十卷九期（民國四十四年）。

姚從吾，「元憲宗（蒙哥汗）的大舉征蜀與他在合州釣魚城的戰死」收入〔姚從吾先生全集〕（六）（正中書局，台北，

民國七十一年）。

陳高華，「早期宋蒙關係和端平入洛之役」收入〔宋遼金史論叢〕（中華書局，北京，一九八五年）。

黃寬重，「辨端平入洛敗盟」收入氏著〔南宋史研究集〕（新文豐出版公司，台北，民國七十四年初版）。

黃寬重，「宋元襄樊之戰」收入氏著〔南宋史研究集〕。

孫克寬，「元王楸使宋事補」收入氏著〔元代漢文化之活動〕（台灣中華書局，台北，民國五十七年）。

鄒重華，「略論蒙哥、忽必烈的攻宋戰略」。

盧渝寧，「宋蒙（元）兩淮戰場析論」。

胡勇，「論宋蒙（元）京湖戰場」。

屈超立，「簡析宋蒙鄂州之戰與『鄂州和議』」。

以上四篇文章收入湖昭曦編《宋蒙（元）關係研究》（四川大學出版社，一九八九年）。

二、政治人物傳記

1. 專書：

陳世松《余玠傳》（重慶出版社，重慶，一九八二年）。

2. 論文：

姚從吾，「余玠評傳」，收入《姚從吾先生全集》（六）。

黃寬重，「孟珙與四川」收入氏著《南宋軍政與文獻探索》（新文豐出版公司，台北），民國七十九年）。

黃寬重「孟珙年譜」收入氏著《南宋史研究集》。

唐唯目，「南宋名將王堅籍貫再考」收入《宋蒙（元）關係研究》。

王德毅「宋季忠烈汪立信年譜」（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）十四期（民國七十七年）。

朱鴻「真德秀及其對時政的認識」（食貨月刊）九卷五期、六期（民國六十八年）。

孫克寬，「入元宋將夏貴事輯」（大陸雜誌）二二卷二期（民國五十二年七月）。

孫克寬，「劉後村之家世與交遊」。

孫克寬，「晚宋政爭中之劉後村」。

以上二文收入氏著《元代漢文化之活動》。

三、宋末朝政

1. 專書：

黃寬重，「晚宋朝臣對國是的爭議——理宗時代的和戰、邊防與流民」（臺灣大學文史叢刊，台北，民國六十七年）。

2. 論文：

段玉明、胡昭曦，「宋理宗『端平——淳祐更化』芻論」收入〔宋史研究論文集〕（河北教育出版社，河北，一九八九年）。

王 瑛，「綜析伯顏攻宋戰爭中南宋滅亡的原因」。

屈超立，「論呂文德及呂氏軍事集團」。

以上二文收入〔宋蒙（元）關係研究〕。

四、變亂研究

1. 專書：

黃寬重，〔南宋時代抗金義軍〕（聯經出版公司，臺北民國七十七年）。

2. 論文：

趙儷生，「南宋金元之際山東淮海地區中的紅襖忠義軍」（文史哲）一九五四年四期。

孫克寬，「南宋金元間的山東忠義軍與李全」收入氏著〔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〕（文星書店，臺北，民國四十七年）。

華 山，「南宋紹定、端平間的江、閩、廣農民大起義」（文史哲）一九五六年三期。

朱瑞熙，「南宋晏夢彪起義」收入〔宋史論集〕（中州書畫社出版，河南，一九八三年）。

溫 嶺，「南宋末年江西建昌的佃戶暴動」收入〔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〕第三輯（河南人民出版社，河南，一九八一年）。

註釋

- 註 一：蘇天爵〔滋溪文稿〕卷二五「三史質疑」：「理、度兩朝事最不完備，理宗日曆尙二、三百冊，實錄纂修未成，國亡僅存數十冊而已。度宗日曆殘缺，皆當訪求。」
- 註 二：劉子健「略論南宋的重要性」收入氏著〔兩宋史研究彙編〕（台北，民國七十六年，聯經出版公司），頁七九—八〇。
- 註 三：如胡昭曦「要加強南宋後期歷史的研究」〔宋史研究通訊〕一九八四年一期。
- 註 四：江西省歷史學會編〔浩然正氣——文天祥逝世七百周年紀念〕（江西省教育出版社，江西，一九八六年）附「文天祥研究書目、論文索引」。